

《名窑名瓷名家鉴赏》丛书

唐三彩 鉴定与鉴赏

胡小丽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主 编:耿宝昌

副主编:陈 政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莉英 叶文程 朱伯谦 任世龙

刘 杨 汪庆正 李辉炳 张浦生

余家栋 陈 政 赵青云 耿宝昌

总策划:陈慧荪

策 划:刘 杨

首批丛书书目

《越窑瓷鉴定与鉴赏》○

《耀州窑瓷鉴定与鉴赏》○

《长沙窑瓷鉴定与鉴赏》○

《唐三彩鉴定与鉴赏》○

《龙泉窑瓷鉴定与鉴赏》

《南宋官窑瓷鉴定与鉴赏》

《汝窑瓷鉴定与鉴赏》

《定窑瓷鉴定与鉴赏》

《钧窑瓷鉴定与鉴赏》○

《磁州窑瓷鉴定与鉴赏》○

《吉州窑瓷鉴定与鉴赏》○

《建窑瓷鉴定与鉴赏》○

《德化窑瓷鉴定与鉴赏》○

《官窑青花瓷鉴定与鉴赏》

《民窑青花瓷鉴定与鉴赏》

《景德镇彩绘瓷鉴定与鉴赏》○

《景德镇颜色釉瓷鉴定与鉴赏》○

《景德镇青白瓷鉴定与鉴赏》○

《辽瓷与辽三彩鉴定与鉴赏》

《宜兴紫砂鉴定与鉴赏》○

注:○标记为已出版书目

序

我国陶瓷历史悠久,古陶瓷深受世人青睐,国内外倾其毕生精力搜集、珍藏、探索和潜心研究者不乏其人。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对文物研究和保护力度的加强,有关部门对一些历史名窑相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与整理,所掘精品迭出,弥补了古陶瓷鉴赏中历史资料之不足。一些古陶瓷研究与鉴赏中的难题,也随着第一手资料的获得,迎刃而解。不少文物专家、学者,毕其一生着力于一个窑口的探索与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江西美术出版社从需求和可能出发,策划出版《名窑名瓷名家鉴赏》丛书,以各窑系、窑口古瓷的鉴赏为题,约请各方专家著述,这对于系统介绍唐宋以来各名窑名瓷详情、弘扬传统文化,实为可贵。每部书稿资料翔实,论述周详,剖析精微,相形于时下众多泛泛而论的鉴赏之作,实为述而有纲,言而有物。垂注于古陶瓷的鉴赏者如能从一个窑系、窑口的研究出发,触类旁通,这也是古陶瓷鉴赏的一条门径。

《名窑名瓷名家鉴赏》丛书补史料之缺,应大众之需。编撰者已经辛劳数年,今观新篇,欣慰之至,志此数言,是为序。

耿宝昌
于北京

一 唐三彩的产生	(1)
(一) 唐三彩产生的历史背景	(1)
(二) 唐三彩产生的工艺渊源	(12)
二 唐三彩的制作工艺	(19)
三 唐三彩窑址	(26)
(一) 河南巩县大、小黄冶村唐三彩窑址	(27)
(二) 陕西铜川黄堡窑	(39)
(三) 巩县黄冶窑与铜川黄堡窑唐三彩器物的特点	(57)
四 唐三彩的出土	(61)
(一) 陕西地区唐墓出土的三彩器	(62)
(二) 河南地区唐墓出土的三彩器	(71)
(三) 扬州地区唐墓出土的三彩器	(75)
(四) 其他地区唐墓出土的三彩器	(77)
(五) 唐三彩的类别与组合方式	(78)
(六) 全国各地唐墓出土三彩器的特点	(81)
五 唐三彩的对外传播	(85)
六 唐三彩工艺的发展	(103)
七 唐三彩的鉴赏与鉴定	(111)
(一) 唐三彩鉴赏	(111)
(二) 唐三彩撷英	(120)
(三) 唐三彩鉴定	(139)
(四) 唐三赝品例说	(146)
八 彩色图版	(153)

一 唐三彩的产生

(一) 唐三彩产生的历史背景

唐三彩之所以在唐代产生，绝非偶然，它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对外文化交流，与陶瓷手工业的发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首先，唐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空前大发展的一个伟大时代。618年唐朝建立后，统治者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富强的政策，包括改革吏治，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轻赋及检括户口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抑制了土地兼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且适时地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家政权日益强大，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我们从唐代库存就可以看出唐代社会的富足。据记载，仅粮食一项，天宝八年（749年）国家粮仓贮粮“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①。从贞观以来，由于粮食库溢，又频岁丰稔，粮价低贱，“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得一斗粟”^②。一斗粟米仅值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岁时有赠遗……”^③

唐太宗贞观年到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代表了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繁荣面貌。《通典·卷七·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记载：“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634、635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641年）米每斗值两钱……”，“至（开元）十三年（725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饌丰溢。每店皆有驴，凭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州、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十里，不持寸刃。”唐人郑繁著《开元传信记》盛赞这一时期：“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赍粮。”《明皇杂录》云：“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知陇右。”《资治通鉴》卷一九三也记述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景况是“天下大稔”，“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来赍粮，取给于道路焉”。上述记载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它却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

唐代是一个善于总结与继承，能够做到兼收并蓄的朝代，国家的强大、制度的完善、思想的开放、民族的融合、社会的安定，使得各行各业兴旺发达。唐朝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不仅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而且在当时还处于世界强国的行列。

唐代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为手工业生产的相对繁荣，为商品经济的发达奠定了物质基础。唐代手工业工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成就，在丝织业、矿冶业、制茶业、制盐业、制瓷业、金属铸造业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丝织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代。丝绸纺织业到唐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丝

绸的产量、质量和品种都是前朝所无法比拟的。《册府元龟》记载，天宝八年唐朝所收入丝织品的数量就有绢740万匹，锦180余屯，布1605万端。唐代丝绸品种繁多，除传统的綾、罗、绸、缎、锦以外，还出现了新的印染丝绸——彩纈，后来又相继发展了绞纈、夹纈、蜡纈等多种工艺。唐代高级丝绸产品品种多达数十种，真可以说是美不胜收。陶瓷制造业的发展也达到了空前繁荣，唐人陆羽在《茶经》一书中称赞当时邢窑生产的白瓷和越窑生产的青瓷时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对越窑的青瓷也有这样的描绘：“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在金属制造业方面，唐代铜镜制造业也非常发达，“海兽葡萄镜”、“金银平脱镜”等许多铜镜都精美绝伦，令后人称奇。唐代金银器制作是唐代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西安南郊何家村金银器窖藏和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器体现了唐朝金属制造业的最高水平。上述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才有可能吸引丝绸之路沿路各国、各地区与中国进行国际贸易并持续繁荣。

唐朝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加强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形成唐文化兼收并蓄的文化特征。唐朝由于古代文明达到了汉文化高度发展的阶段，从而使它具备了融会、消化西方文明的完备机能。正如鲁迅先生在《看镜有感》一文中所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唐朝社会以其博大的胸怀拥抱着世界，吸收着外来优秀文化。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人口达100万之多。长安不仅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且也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著名的丝绸之路就以长安为中心，通过陆路和水路将亚、非、欧各国与大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并且融入到世界文

化体系当中。《唐六典》(卷四)记载唐王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交往。在长安城内,设有鸿胪寺、典客署、礼宾院等专门机构,负责接待外国宾客和少数民族使节,其中东罗马帝国曾经7次派遣使节来到长安,阿拉伯帝国于651年~798年,曾36次与唐朝通使,在唐高宗时期波斯王子泥里师从长安统率回国的部属一次就有数千人。国家的富裕、人民的安定团结,使成千上万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使者、留学生、商人和僧人频繁往来于大唐。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受到唐朝法律的保护,他们中的许多人留居在唐两京地区和一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据《旧唐书·田神功传》记载,在扬州一城就有波斯胡商数千人。天宝以来,留居长安的胡客有4000人,长安西市专设胡市,他们都因为通过与大唐经商而致富,纷纷“买田宅,举质取利”^④。唐德宗时,中亚胡商有4000人久居长安达40多年,这些胡商将少数民族和外国的文化艺术源源不断地传入内地,反映在文化艺术领域里,诗赋、绘画、雕塑、乐舞等文化艺术迅速地发展起来,呈现出姹紫嫣红、欣欣向荣的景象。唐朝政府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加之唐朝国力强盛,对于外来文化吸收和消化的能力很强,其兼容和吸收外来文化中新鲜养料之广泛和深入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

唐文化的世界性也同样不能忽视。唐文化一方面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又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唐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可达欧洲的罗马城,东可抵日本,世界古代文化中的东方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都因为丝绸之路的连接而深受唐文化的影响,并且从唐文化中吸取精华,丰富自己的文化。如中国的蚕种、桑种于6世纪初至7世纪先后传入东罗马帝国、波斯、阿拉伯和埃及,紧接着阿拉伯人将养蚕的技术传入西班牙,12世纪传入意大利,15世纪又由意大利传入法国。中国造纸业于天宝十年(751年)怛逻斯战役后开始西传,中亚一带开始建造纸厂。793年波斯开始造纸,793年~794年在巴

格达建立造纸厂，随后埃及、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也相继开始造纸，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在日本，平城京的城市设计思想、建筑布局、功能设置等基本上都是仿照唐长安城而设计建造。日本各地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文物都蕴涵着唐文化的精粹。唐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不仅对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而且促进了中国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为唐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中国向外传播东方文明的同时，西方的阿拉伯、波斯、两河流域和南亚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影响了中国文化。沿丝绸之路传入大唐的各种工艺技术、服饰、器物、葡萄、石榴、天马、狮子、骆驼、鹦鹉等方物异产和少数民族的乐舞、乐器中的琵琶、箜篌、箎、腰鼓等，以及佛教艺术中的忍冬纹、蔓草纹、连珠纹、宝相花纹都成为唐代艺术的表现对象，被广泛应用于陶瓷器、金银器、墓碑、铜镜、石刻等上面，为唐代工匠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为唐代工艺美术增添了新的光彩，“骆驼载乐俑”和“三彩凤首壶”就是典型的例证。唐王朝对外来文化的广泛吸取，不仅为唐三彩艺术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也创造了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唐文化。正如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所说：“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艺，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⑤

唐代与国内外地区间的文化经济交流和发展与唐代交通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朝交通十分发达，从长安出发，陆路交通有四条主要线路：东路自长安经洛阳至开封、商丘；西路从长安出发经岐州（今陕西凤翔）至成都；南路从长安出发至荆（今湖北江陵）、襄（今湖北襄樊），往南经长沙、广西到定州；北路自长安至太原，出娘子关至范阳（今北京），或沿黄河向东转北达范阳。据《唐六典·驾部郎中员外郎》记载，当时全国有官驿1639所，其中陆路驿站1297所，水路驿站260所，水陆相兼的驿站有82所，再加上通往域外的丝绸之路，唐代交通可谓四通八达。完

善而发达的交通，是唐代经济发展和文化大放异彩的主要条件。

其次，唐三彩的出现还与统治阶级豪华奢靡的生活方式以及唐代盛行的厚葬之风密切相关。丧葬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们寄托对死者哀思的主要方式。在中国古代，人们思想里普遍存在着灵魂不灭的观念，同时受孝道礼仪的影响，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等级差距的扩大，统治阶级和富有者在丧葬上表现出日益追求奢华丰厚的趋势，这就是所谓的厚葬之风。纵观历史上丧葬习俗的发展演变，概而论之，秦汉时期厚葬的风气首先盛行，受社会动乱的影响，魏晋南北朝丧葬之事较为俭薄，隋唐及后来的明清诸代，厚葬之风又大盛起来，特别是唐代，由于封建经济发达，国家富裕，使得厚葬之风更甚。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达官贵人都幻想着死后继续享受生前这种奢侈生活，于是把生前所拥有的一切，从文侍武卫、歌舞伎、妻妾奴婢，到马牛驴驼、飞禽走兽，以及盘、碗、瓶等生活用具都制作成三彩器带入墓中，用来陪葬，供死后继续享用。唐朝从618年高祖李渊称帝至907年唐哀帝李柷亡国共289年，历经21个皇帝，留下20座皇陵（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一陵）。其中除昭宗李晔的和陵在河南洛阳、哀帝李柷的温陵在山东菏泽外，其余高宗李渊的献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中宗李显的定陵、睿宗李旦的桥陵、玄宗李隆基的泰陵、肃宗李亨的建陵、代宗李豫的元陵、德宗李适的崇陵、顺宗李诵的丰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文宗李昂的章陵、武宗李炎的端陵、宣宗李忱的贞陵、懿宗李漼的简陵、僖宗李儇的靖陵等集中分布在陕西关中盆地的北部，统称“关中十八陵”（图1）。唐十八陵气势雄伟，规模宏大，其分布范围东西绵延100多公里。帝陵内部陪葬物，由于还未发掘，目前尚不得而知，但从其地面的设施，已经能够看到奢华的程度。如位于陕西乾县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陵墓前修筑平面呈方形的内城，四面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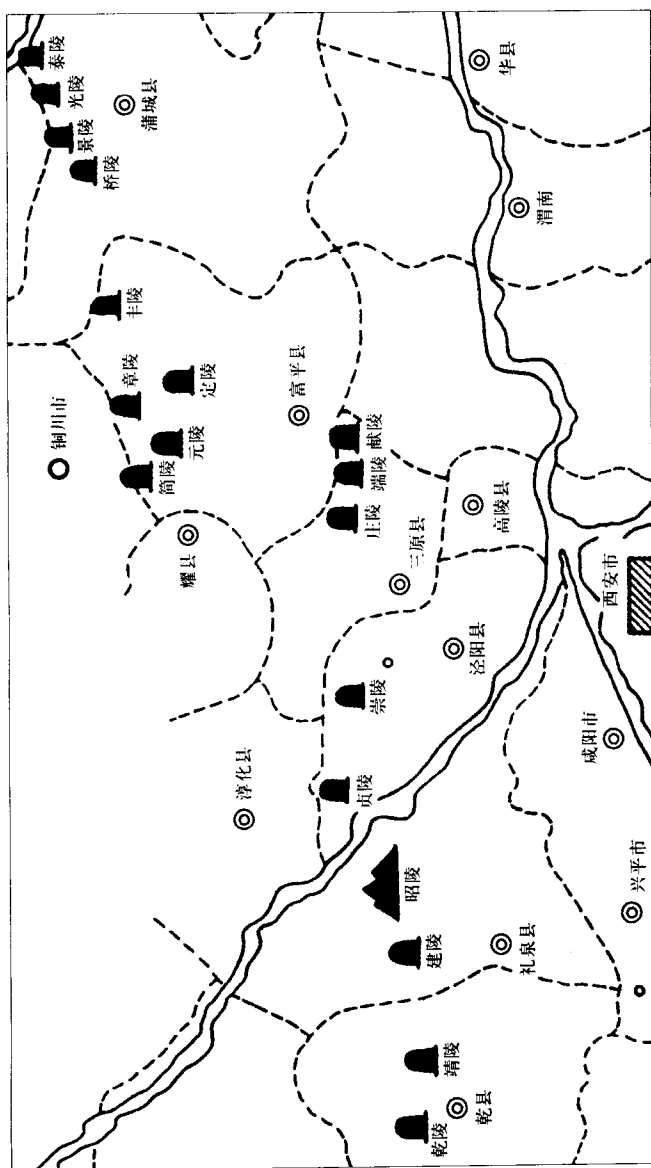


图1 陕西关中唐十八陵分布图

开一道门，门外各置石狮一对，筑阙台一对。城垣四角建角楼。南面的朱雀门是正门，入门即为献陵。朱雀门外设神道，长650余米，两旁自南而北依次排列华表、翼马、鸵鸟、仗马、翁仲、无字碑、述圣纪碑、61王宾像等。现存陵墓石刻共计110件，其数量、规模均居唐帝陵之冠。乾陵地面石刻群的宏大规模，充分显示了唐王朝处于顶峰时期的强大国力。帝王陵墓周围陪葬的王公大臣墓葬的规模虽然比不上皇陵，但营造时也极尽奢华。除皇帝陵墓之外，还有达官显贵和富商大贾之墓不计其数。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共清理和发掘了数以千计的唐墓，仅陕西省境内就有2000多座，出土了数量众多、绚丽多彩的三彩器物。这些器物以造型生动、色泽艳丽、生活气息浓厚而著称国内外，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动物形象，都堪称是唐代艺术之杰作。它们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也是盛行于唐代厚葬之风的反映。

唐朝殡葬之事，由中央政府设有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唐代“门下省”下辖的“甄官署”，就是专门负责制造皇亲贵戚陵墓所需要的明器。唐代厚葬之风自唐朝建立不久就大兴起来，为此，唐太宗在贞观前期就指出：“虽送往之典，祥诸仪制。失礼之禁，著在刑书，而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俗，闺阁之内或奢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寿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极雕刻之华，灵车而明器，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极尚，贫者破产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⑥唐典明文规定，不同等级的官吏，死后要随葬相应数量的明器。《唐六典》记载了不同等级的官员死后使用明器的数目，即三品以上90事，五品以上70事，九品以上40事，而且还规定各种器物的高度不得超过0.33米。但实际情况是随着厚葬之风的逐渐盛行，皇亲贵戚和各级官吏用于殉葬的明器远远超过了中央政府所规定的数目。皇室厚葬，势必影响下层，我们从文献记载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当时厚葬之风

的盛行。《唐会要》卷三十八记载了太极元年（712年）六月左司郎中唐绍上书于睿宗的疏文，在疏文中唐绍疾呼：“近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请王公已上送葬明器者皆依令式，并陈于墓所，不得衢路舁行。”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正月十五日敕：“古之送终，所尚乎俭，其明器墓田等，令于旧数内递减。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请减至七十事；五品以上先是七十事，请减至四十事；九品以上先是四十事，请减之二十事；庶人先无文，请限十五事；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木及金银铜锡。其衣不得用罗锦绣画；其下帐不得有珍禽异兽，鱼龙化生，其园宅不得广作院宇，多列侍从；其輶车不得用金银花结彩为龙凤及垂流苏、画云气。其别勅优厚官供者，准本品数十分加三等，不得别为华饰……其送葬祭盘，不得作假花果及楼阁，数不得过一牙盘。”①《唐六典》说：“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亟为之贰。凡石作之类，有石磬、石人、石兽、石柱、碑碣、碾础出有方土，用有物宜。凡砖瓦之作，甄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准。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别勅葬者供，余并私备。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当圻当野，祖明地轴，诞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为之，其长率七寸。”《唐会要》宪宗元和六年条又说：“文武官及庶人丧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五品以上，明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九品以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以前明器并用瓦木为之，四神不得过一尺余，人物等不得过七寸，并不得用金银雕镂帖毛发装饰……庶人明器一十五事。”②武宗会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条说：“京城文武百僚及庶人丧葬事，三品以上用阔轍车，方相魂车、志石车、并须合轍、油幌流苏等，任准令式，挽歌三十六人，六铎，六翟；明器并用

木为之，不得过一百事，数内四神不得过一尺五寸，余人物等不得过一尺，舁止七十舁，内外官同。五品以上輶车及方相魂车等同三品，不得置志石车；其油幌等任准令式；挽歌十六人；四铎四翬，明器不得过七十事，数内四神不得过一尺二寸，余人物不得过八寸，舁止五十舁，内外官同。九品以上輶车、魂车等并同合轍车，其方相魃头并不用楯车及志石车，其輶车除油幌、流苏等各准令式，不得用繒采结络兼银器装饰，挽歌一十人，一铎二翬，明器不得过五十事，四神不得过一尺，余人物不得过七寸，舁止三舁，内外官同……工商百姓诸色人吏无官者，诸军人无职掌者，丧车魃头同用合轍车，丧车不用油幌流苏等饰，兼不得以繒采结络及金银饰，挽歌、铎翬，并不得置；丧车之前不得以鞍马为仪；其明器任以瓦木为之，不得过二十五事，四神、十二时并在内，每事不得过七寸，舁十舁……前令式及制，皆务从俭省。减刻过多，遂令人情易逾禁。将求不犯，实在稍宽。臣酌量旧仪，创立新制，所有高卑得体，丰约合宜，免令无知之人，更怀不足之意。伏乞圣恩，宣下京兆府，令准此条疏，宣示一切，供作行人，散榜城市及诸城门，令知所守。如有违犯，先罪供造行人，贾售之罪，庶其明器，并用瓦木，永无僭差。”^⑨可见唐代厚葬之风自上而下盛行，并且已经达到了不惜资财，倾家荡产的程度。这些禁令和呼吁，实际上并未奏效。至玄宗开元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日益丰足，百官士庶更是采取厚葬的方法葬殓其亲，“共行奢靡，遂相仿效，浸成风俗”^⑩。一直到了唐代的后期，政府仍然在呼吁：“丧葬之礼，索有等差，士庶之家，近罕遵守，逾越既甚，靡费滋多。”^⑪可以想见，厚葬之风，终唐之世也未能煞住。

面对越来越盛的厚葬之风，唐朝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仅《全唐文》中记载的“禁厚葬诏”即有：

太宗贞观十七年（643）三月：薄葬诏；

高宗龙朔二年（662）三月：禁止临丧嫁娶及上墓欢乐诏；

武则天证圣元年（695）三月：禁丧葬逾礼制；

玄宗开元二年（714）八月：禁厚葬制；

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禁殡葬违法诏；

天宝年间：禁丧葬违礼及士人干利诏；

代宗大历七年（772）六月：申约葬祭式敕；

宪宗元和年间：禁厚葬诏。

这些诏敕禁令，充分反映了厚葬之风在唐代盛行之程度。

另据考古发掘资料统计表明^②，唐代对墓室的大小结构、墓道长短、天井多少及其随葬俑的数量等，都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二品官以上为第一等，墓的结构为双室，其主室平面在5米×5米以上，有石门、石棺、石槨，甬道有天井、小龕，随葬俑有的可达400件以上，墓前地面还置有石刻；五品官以上为第二等，墓的结构为单室，平面在4米×4米左右，开两个以上天井和小龕，随葬俑一般在40件以上；五品到九品的下级官吏为第三等，墓室为单室，平面为4米×4米到3米×3米之间，绝大部分没有天井和小龕，个别的开一两个天井，墓道的两侧开两个小龕，随葬俑在10件~40件之间；第四等就是无官品的庶人墓，皆为单室，平面在3米×3米以下，无天井和小龕，随葬俑的数量限制在10件以下。而实际上皇亲贵戚、各级官吏都纷纷互相攀比，随葬品数量往往超过规定的范围。

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顶峰期，特别是到了唐开元年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进步，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据史书记载，当时“四方丰稔，百姓殷富”，“人情欣欣然”^③。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忆惜》诗中写道：“忆惜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厚葬提供了物质财富。生前极其所欲，死后厚葬，王公贵族、大小官吏“事死事如生事”，于是他们把生前所拥有的一切都带入墓中，供自己在阴间继续享用，因此唐墓中的随葬品都十分丰富，数

量浩大，规模惊人。唐代社会这种互相夸富、互相攀比、互相炫耀的厚葬风气极大地刺激了唐三彩的烧制，唐三彩器就在这样厚葬之风盛行的历史条件下大规模发展起来。

关于在墓葬中俑的随葬数量、高度等的规定

规定 时间	三品以上	五品以上	九品以上	庶人	高低限度等
开元二十年 《通典》	90 事	70 事	40 事		四神骏马不过尺，余不过七寸。
开元二十九年 《唐会要》	70 事	40 事	20 事	15 事	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木及金、银、铜、锡，其衣不得用罗锦绣画。
元和六年 《唐会要》	90 事	60 事	40 事	15 事	四神不得过一尺，余人物等不得过七寸，不得用金、银雕镂、贴毛发装饰。
会昌元年 《唐会要》	100 事	70 事	50 事	25 事	四神三品以上不得过一尺五寸，五品以上不得过一尺二寸，九品以上不得过一尺，庶人不得过七寸。其余三品以上不得过一尺，五品以上不得过八寸，九品以上不得过七寸，庶人不得过七寸。

(选自《隋唐考古》)

(二) 唐三彩产生的工艺渊源

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厚葬之风的盛行只是为唐三彩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其根本原因则是制陶工艺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

唐三彩的产生与汉代低温铅釉陶的发明与使用有很大关系。我国制陶业到了汉代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崭新阶段，汉代工匠们已经能够很好地掌握铅釉的使用方法，并且将它应用到陶器上，制造出了一种新型陶器——铅釉陶。低温铅釉陶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它对后世陶瓷器的生产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来的唐三彩和各种釉上彩工艺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汉代低温釉陶器，与我国早在商、周时就已经发明的，以氧化钙为主要溶剂，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青釉不同，它是以铜和铁的氧化物作呈色剂，以铅的氧化物作助溶剂的釉，铜使釉产生美丽的翠绿色，铁使釉呈黄褐色和棕红色，在氧化气氛中烧成。因为铅釉陶烧成温度低，熔点大约在700℃左右，所以叫低温铅釉陶器。铅釉陶器的特点是：釉的熔融温度低，高温下黏度小，流动性较大，能够比较均匀地覆盖在器物的表面，冷却后釉汁清澈透明，表面平整光滑，釉面光泽感强，折射指数较高，光彩照人，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对于金属铅性能的认识，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殷商时代的安阳殷代墓中就曾经出土过用铅金属制作的卣、爵、觚、戈等成组器物。洛阳博物馆收藏有一组西周时期的铅质器物，器形有尊、卣、鼎、爵、觚、觶。从春秋中叶开始，工匠们在冶金过程中对于铸造器物的合金性能就提出了“熔点低”和“流动性大”的要求，并且采用在青铜中增加锡的比例或在铜锡中加入铅的办法来达到这种要求，特别是在青铜中增加锡的比例，对于液态合金流动性的提高起了主要作用。也就是说，对于金属铅在冶金中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工匠们所掌握。先秦时期还出土了含铅的玻璃小球，说明金属铅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汉代工匠总结前人的经验，将铅金属的应用推广到了陶器的生产上，于是就发明了低温釉陶器。

这种釉陶器在陕西汉中地区首先被发现，器物生产年代是在